

引 子

提起笔 长须飘胸、道貌岸然的冯友兰似乎就在我的眼前。冯先生是讲究行状气象的 这大概就是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圣贤气象吧。

冯友兰，在大多数知道他的人心目中，是一个中国哲学史的权威。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给孔丘一个回马枪”（这是当时一个知识青年在给冯的信中赞扬他的话），从而赢得了当时左派们的青睐，又遭到了后来人们的非议。其实，冯友兰远比一般人所了解和议论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要说争议，他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冯友兰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创作是建立在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与新实在论有深刻的领悟，他的老师杜威曾说过：

Mr. Feng is a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re. (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30年代中期，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使他成为第一个用现代眼光真正将中国哲学“打通”的人。仅此一点，就足以青史留名。然而，他不愿只做哲学史家，而立志要成为哲学家，这是他的使命。就在他理想转换的关头，抗战爆发了，这一事实，更强化了其使命感。

《易经》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冯友兰把自己在抗战期间写的六本哲学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统称为“贞元六书”：

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贞下起元”用一句时髦的也是很符合《易经》原意的话说就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教育家所能为者就是鼓动民族自信，一个哲学家所能为者就是为这种

自信提供民族哲学的依据，这正是一身二任的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所做的。成书于抗战初期的《新理学》首印本扉页上的题诗云：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鲁鱼亥豕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当时冯友兰住在著名的南岳衡山，10年后，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中国哲学演说时，曾深情地讲起南岳的哲学故事：

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

的确，冯友兰的新理学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也融进了其师蒙太格新实在论的思想，但它绝不是“宋明理学和实在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而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一尝试虽有败笔，人们尽可以批判其所谓唯心的谬论，但谁也抹煞不了其“融贯中西、

通释古今”的特点。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

“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熊氏哲学体系中，“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考问题，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和感情，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我们应该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认识冯友兰哲学的历史地位：立足于中国看文化，则先有南北文化交融而有中国文化，然后有中印文化交融而有东方文化，然后有东西文化交融而有世界文化。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就哲学说，南北文化交融就是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结合，中印文化交融就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东西文化交融就是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结合，而冯友兰哲学的构成恰恰有机地融铸了道家、儒家、佛学、西学，因此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世界现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它扮演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中介角色：在可信与可爱之间周旋，使其成为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中介；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涵泳，使其成为纯哲学意义上复古与西化的中介；

在思古与忧今之间穿梭，使其成为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中介；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求生存，使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在旧邦与新命的天平上权衡损益，使其成为今天与明天的中介……

老黑格尔断言，没有中介便没有真理，这就从哲学上为我们论证了冯氏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而张申府先生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一段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话，则为冯氏哲学提供了文化依据：

中国文化，要孔子、罗素和马克思三位一体结合起来，《新理学》已经是有代表性的杰作！

这番话当时就遭到了进步文人杜国庠、侯外庐等先生的批判，但它所表达的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再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愿望，大概无论进步还是保守人士都不会轻易否定吧？

除了在哲学上的贡献之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

许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发觉，要对中国的传统经典有所钻研，首先还要向冯先生请教。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这些都增强了我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在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中国人要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我常说，冯先生可超

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平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于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人们要对中国哲学有一个大概而有系统的了解、要对中国文化品头论足，恐怕不能不借助冯友兰的著作。美国学者 D·卜德博士写道：

在中国，冯友兰名望很高，因为他既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史学家，又是有所创新的哲学家。在西方，他的声誉主要基于他撰写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其中有我译为英文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他用英文写作经我编订的《中国哲学简史》，后者更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这两种哲学史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何止是教材！许多举世闻名的鸿篇巨制凡讲到中国哲学也常以此为主要参考材料。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因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大概不算夸张。

无论是阐释前贤高见，还是讲解自家道理，冯友兰终生抱定的哲学观——哲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始终是他信念的根基

和不断创新的源头活水，而境界的极致——按冯友兰自己的观点——是天地境界。因此，哲学是通向天地境界的唯一大道。冯友兰哲学和他所写的哲学史说穿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中国人昭示通天之道。据此，用程明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来概括冯友兰的气象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冯友兰在中外学术界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在其有“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位运用语言的大师、一位杰出的哲学教育家，其著作之流畅明晰、语言之引人入胜，在当代哲人中堪称一绝。那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是一种真佛家常之言。

冯友兰一辈子不甘寂寞、不甘落伍。“求新”是他的著作也是他本人的使命、生命与宿命！贞元六书无一不冠之以“新”名，晚年巨著仍命其为“新编”。冯友兰之心路乃“新”路，冯友兰之心血乃“新”血，冯友兰之心声乃“新”声；难怪一位终生敬仰冯先生的学者深有感触地说：冯氏哲学与其说是唯“心”论，不如说是唯“新”论。不仅在顺境中新意迭出，而且在逆境中常发奇想；不仅在古稀之年有“新作应需代旧刊”的宏愿，就是在近百岁之际，每每口若悬河发“非常可怪之论”，使许多风华正茂的学子自叹弗如！临终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喃喃自语：“住在医院里，又懂得很多道理……”

何以如此？一是其“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使命感使然；二是他所理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使然。有一次，冯友兰闯进一位西方学者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冲着人家发了这样一通议论：

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 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 天下也没有停顿。
《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这位西方学者深有感触地说：“我认为这是我听到的对西方思想方法的最有见地的一个评论。”当然 这也意味着对中国哲学之神髓最有见地的体悟。有了这段话 对冯友兰一辈子与时俱进 难道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

庸庸讳言 冯友兰解放前曾两度加入国民党 三次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哲学 解放后 不仅对自己有过过火的自我批判 也以左的腔调批判过别人 批林批孔运动中 又跟着所谓评法批儒走了一阵。以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 海内外于此不能无微辞。然而 脱离历史条件着意渲染 甚至送上“蒋介石的高参、四人帮的顾问”这样吓人的大帽子 恐怕也言过其实 起码是缺少宽容精神。冯友兰两次加入国民党（第一次是 1924 年 第二次是 1939 年）都是国共合作时期。三次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哲学 都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就是这些问题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 甚至不惜上纲上线 以有说无，知情人心中都觉得够彻底的了，但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先生由于素与政治无涉 在运动中过关较快 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 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 金岳霖就大声说道：“芝生呀 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 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 就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两位老朋友哭得如此凄惨，在场的人无不转身拭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觉的思想改造与扭曲的舆论引导相结合，造就了冯友兰“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心理定势。50年代中期，冯友兰与张岱年同为北大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冯友兰主张讲课时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应先批判后讲解，可刚毅木讷的张岱年脑袋还没“开窍”，固执地认为怎么也得先讲清楚了再批判，两位教授就为这一今天人们看来近乎可笑的“问题”着实“争论”了一番。冯友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首当其冲受冲击，每次他都说“受到了不少的教育”，但总的说他还是被动地被人们牵着鼻子走。批判别人、批判自己在当时看来绝不是迎合什么人，而是哲学日新、日日新的体现。所以，很多次他是以其自觉追求真理的良好初衷，给别人当了谋取政治资本的垫脚石。可悲的是他对给人当枪使以致引起自我毁灭的危险却并没有一点儿察觉。回想那天昏地暗的“运动”时期，狂风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目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能有几人；风雨过后，认真反思，解剖自己，敢言诚伪，回归自我，再创奇迹者，在众多过来人中，屈指能有几人？我宁肯把冯友兰个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悲哀，看成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悲剧！

我愿以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的结语结束我喋喋不休的议论：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一、衙门里的少年

1. 签押房的书迷

1907年，12岁的冯友兰随时任湖北崇阳县知县的父亲生活在衙门里。

衙门中县官办公的地方叫签押房。在冯友兰父亲冯台异的签押房里有很多书，还有当时新出的一些刊物。崇阳县衙签押房当时的一大景观，就是床上经常有一个小书迷，他什么都看，尤其喜欢那些新出的刊物，如《外交报》之类，这是专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新闻的，这些刊物使这个书迷眼界大开，从小就有了一种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书迷就是台异公的二儿子冯友兰。令冯友兰感到惬意的，不仅是这些书刊使他神游环宇，而且还有父母对

他沉湎于杂书之中的宽容，也许正是这种随心所欲乱翻书的宽松气氛，使冯友兰十分留恋这段书迷生涯，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

当然，除了这种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浏览之外，还有正式的功课。这些功课主要是：古文、算术、写字、作文。古文读的是《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其中所选贾谊的《过秦论》之类的文章很合冯友兰的口味，他高声诵读“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时，常为那磅礴的气势、壮阔的场面所陶醉。

在衙门里念书，除了曾有一段是教读师爷给冯氏三兄妹正规上课之外，大部分时间靠的是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的监督和诱导。冯友兰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

 及到崇阳，先寓茶厘局内，行装甫卸，（先妣）即教友兰等读，屋宇逼仄，书声闻于外……及迁入县属，先考为友兰等专延一师。然不数月即他去，仍由先妣督读。

1982年冯友兰曾作过一首诗，其中深深地感叹“早岁读书赖慈母”。吴清芝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她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启蒙教育，教育子女是她一生最大的一门心事，她经常琢磨并和丈夫讨论如何使子女成人，不仅尽己所能督促冯友兰兄妹苦读经书、作文练字，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激发他们读书学习的兴趣。当时，冯氏兄妹中如果谁按规定流利地背完一本书，她就赏给两个热乎乎的鸡蛋。这种朴素的激励方式，渗透着深深的母爱，冯友兰兄妹对母亲的良苦用心虽不能说是心领神会，但也确能体

悟几分 她的期望最终没有被辜负。冯友兰成了著名的哲学家 冯
恭兰(沅君)成了著名的文学家 冯景兰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这
一切都与吴清芝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从小她就给冯友兰
兄妹营造了一个读书求上进的良好家庭氛围。

2. 扶枢归唐河

冯友兰秉性颖异，从小善于观察，在生活中不仅能读有字之
书，而且还巧读无字之书。尽管父母对他们管束颇严，他几乎从
未出过衙门的大门，但却可以偷偷地翻看签押房的公文，甚至
“旁听”父亲审案子 对世间的人情冷暖、是非短长渐渐也有所了
解。有时还能从父亲的堂谕中窥到官样文章的妙用。

大概是过完光绪三十年（1904年）端午节不久，有一天崇阳
城外的金沙镇出了一桩人命案，案情不是十分明了，台异公只好
亲自出马验尸。此镇离县城有几十里，四周群山环绕如堵，沟壑
迂回，道路难行，使台异公感到十分疲倦。加之金沙镇一带树木
繁茂，阴气太盛，他有些伤风，从此一病不起，不几日便去世了。
当时只说是“紧病”其实是脑溢血。父亲的死 给冯友兰很大的
打击。他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一个优裕的读书、观察、思
考的环境。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转引当时一名秀才的挽联 高
度评价了父亲短暂的一生：

是上国栋梁，大任能胜，可惜无端遭摧折；
真下民父母，诚求务中，谁教哭泣失瞻依！

冯台异字树侯，号复斋，又号后乐生，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赐同进士出身，后任职武昌，兼任粤汉铁路勘测队弹压委员。思想上接近洋务派。能诗善文，有《复斋遗集》7卷遗存。在崇阳知县任上刚刚干了一年，卒时年仅42岁。

父亲对冯友兰的影响虽没有母亲那么直接具体，但也是不容忽视的。父亲做人的那种规矩、办事的那种忠敬、处世的那种豁达，都曾在冯友兰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父亲刻有“实事求是”4个字的小象牙图章，对他一生为人治学有着重要影响。

父亲去世以后，冯友兰的三叔爽亭公从河南唐河老家来崇阳料理丧事，冯知县的幕僚们趁机报亏空、印草契捞了点钱，引起了冯家叔嫂的反感，也使冯友兰懂得了父辈为人的清廉正直。办完丧事，冯友兰随叔父和母亲一道扶柩北上，通过水路奔唐河而去。

3. 清水河畔

冯友兰祖上并不是河南人。冯氏原籍山西省高平县，清初来河南唐河县祁仪镇经商，以酿酒为业，字号复盛馆，想必在晋地曾有过辉煌。来祁仪后，“复盛馆”冯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复盛的愿望。

祁仪镇在唐河县东南部，距县城约50华里，毗邻湖北省南

为枣阳县，东为桐柏县，东南方为随县，因有两省四县之说。境内多山川，山清水秀，有古塔凌烟、紫玉龙渊、莲花捧佛等景观。

祁仪一带世居者不多，多数人家据考都是从湖广、江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内实”而来，南北文化的融会与杂交，使这个中原小镇文脉颇盛，既有北国之雄豪，亦有江南之灵秀。冯友兰小时候常听长辈讲李兰馨连中三元的事迹。李中进士后返乡祭祖、登门谢师，使进学、尊师、重教办私塾成为一时风尚。

祁仪镇因祁河、仪河而得名。其实，这两条河在镇上已汇合而称为清水河了。冯友兰家就坐落在这清水河畔。院内有一棵银杏，还有几簇腊梅。银杏展现着孔门遗风，腊梅象征着傲雪的命运。三进大院里住着二三十口人，三门上所嵌“耕读”二字代表了冯氏家风。

冯友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十八日（1895年12月4日）出生在清水河畔的这个大院，在亲堂兄弟中排行第六，在小家庭中尚有姐姐温兰和哥哥新兰。

冯家大院当时的家长是冯友兰的祖父，他名玉文，字圣征，虽一生无功名，但却是一个真正的文人雅士。冯钟粒曾在《读三松堂自序 家世部分随笔》中写到：

他对老师非常尊敬，重视老师的要求。每天早上总是起床后穿好长衫，到老师床前施礼，恭请老师起床。有一次吃绿豆面条，老师说黑豆比绿豆更对身体有益，他就叫家中以后改用黑豆面作面条。

他的这种态度对子孙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精神熏陶下，他的三个儿子好学上进，都有了秀才的功名，孙辈中更是人才济济。

冯家有善作诗的家风，圣征公的《梅村诗稿》被新野名士赵一士比作邵雍的《击壤集》。鹤亭公（冯友兰的伯父）则有《知非斋诗集》。不仅男人们善弄文墨，自有别材，就是女子，也有能作诗者。冯友兰的姑姑冯士均去世时才 18 岁，却留下了不少很有韵味的诗 家人将其编为《梅花窗诗草》 鹤亭公《梅花窗诗草序》云：

余亡妹幼聪敏绝人，识字辄不忘。稍长，与余及仲弟同受学于杨贤堂先生，读书甚颖悟，作文飘飘有凌云气。尤长于诗，清辞丽句，得晚唐风味……若天假之年，使不懈而及于古，安知不如断肠漱玉诸作长留天地间耶？

环境的熏染往往胜过刻意的栽培，冯友兰儿时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 初人士林

20 世纪的钟声在中原大地上敲响的时候，冯友兰 5 岁。这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祖国是在屈辱中进入新世纪的。

1901 年，冯友兰在学屋里拜师，从表叔刘自立读书。他是先生加表叔的第八个弟子，家塾中的同窗都是他的堂表兄弟。其中

有一个叫郝春华的表哥，在他家很受宠，恃才傲物，爱耍小聪明。有一回，哥几个在一起背书，刘先生有事出去了，郝春华坐不住了，跑过来跟大家起哄，冯友兰不理他，照旧读自己的书，郝春华一把拧住他的耳朵，将他的头按在书桌上碰了起来，一边碰一边粗声喊道：“老六对老六，低下头来受！”冯友兰也不求饶。郝老六刚一松手，他又开始背书了。他从小便养成了宽厚忍让的性格。

冯友兰一边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一边接受着这个大家庭多方面的教育。他的伯父鹤亭公有《训子侄四章》他当时也能脱口而出：

读书万卷道无穷，陋要一言执厥中。
莫学浮华新习气，谨遵纯朴旧家风。
但能遏欲斯存理，若不徇私即大公……

后来，冯友兰跟随父母到了武昌，台异公受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差遣，任武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这方言学堂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产物，从校名就可以看出天朝心态的作怪，汉语是“官话”，异国语言文字皆为“土语（方言）”。不过，对冯友兰来说，在武昌方言学堂的这段时光也是十分珍贵的，在这里他初步感到了新学旧学兼备的好处，虽然在当时他不可能懂得张之洞《劝学篇》“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道理，但他已体会到新学更接近生活。冯友兰的父母思想也很开明，凡是当时新式学校里传授的新知识，他们都想方设法让冯友兰三兄

妹多接触一些，甚至还给他们做了学校里统一的制服，教唱由张之洞亲自作的《学堂歌》。这《学堂歌》先唱天子图强兴学的良方，再咏新学各科的要点，有不少天文地理方面的常识，可以激发儿童们进一步求知的欲望。冯友兰一生视为使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他学唱《学堂歌》时已经在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那里成了大问题了。正是写了浅显易懂的《学堂歌》的这位张大人，在 1898 年写成著名的《劝学篇》，为古今中西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套方案：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多歧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恢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今欲强中国、存中学，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其害。

光绪皇帝见了这部书，很欣赏，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